

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,我搬到新华路居住以来,已有20多年了,闲暇之际,我常常在新华路散步,这里的环境,对我来说,太熟悉了。国宾馆两边美丽的梧桐树;万国建筑群以及外国弄堂;还有香花桥、上海影城……但是,对我来说最难忘的,还是新华路639号——一个外表看上去很平常的地方。

这幢房子,几经周折,有时候大门紧闭着,有时候会搭起来脚手架,有时候又停止了,直到如今,我也搞不清楚它的归属。但是,只要我走过这里,总是会停下来朝里面看看,有时候,不由自主走进去,和保安聊聊。往事像电影一样在我面前出现,那是五十多年前……

一个炎热夏天的中午,正好是午休时间,我从家里走到新华路凯旋路口,已经是汗流满面了。此时,妈妈早已在门口等着我了,手里拿着一瓶冰酸梅汤,这是她省下来的,我一咕隆就喝掉了大半瓶。然后,妈妈就推着黄鱼车,带我向新华路走去。在639号门口停下,只见两扇破旧的大木门敞开着,地面是弹硌路,高低不平。妈妈把车子推了进去,只见地上堆着一堆堆不同规格的木料,在靠近墙壁里面还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帆布雨棚子。原来这是一家木材商店,那时候,习惯称呼它为“木行”。妈妈一边拿出户口本上同意买木料的证明给营业员看,一边挑选着木料。我看到妈妈的脸上露出了抑

制不住的笑,因为,有了木料,家里的小阁楼就可以搭起来了,地方也可以宽敞点了,有我的小天地了。就在几天前,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我家来现场测量,检查一下是否符合条件买木料?搭建一个阁楼,需要多少木料?当时买木料,要凭户口本去申请,还要上级部门审核、敲章,一户只能买一次。登记后,还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才能买到。今天终于轮到我家了,多高兴啊!

妈妈挑好两根长的方子木料和十多根长短不一的木料,和我一起去抬放在黄鱼车上,兴冲冲地推着车子回家。虽然是炎炎夏日,我根本不感觉热和劳累;妈妈则用力快步拉着车,她下午还要上班呢。回到家后,邻居们也很羡慕我们,问这问那,还帮着我们一根根搬下来。这天晚上,妈妈说:“这个月厂里还有24元互助金拿到了,这个礼拜天,去买肉,烧红烧肉吃!”妈妈每年都参加互助金小组:12人一组,每人每月出2块钱,然后抓阄,摸到是几月就可以在几月拿24元,这是当时流行在工厂车间基层生产小组里常有的一种互济互助法。

几天以后,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在家门口,原来是妈妈厂里的临时工,附近生产队的农民。厂里任务紧张会临时招一些季节工来打短工,他和妈妈在一个小组干活,他对妈妈说,他家急需木料和钱的周转,前不久,台风来了,房子和农舍需要加固,不然的话,房子

宁静的江南秋夜,墙角花草丛中,总会传来阵阵清脆悦耳的鸣叫声,这是“蟋蟀”们从夏至秋,每晚必会上演的演唱会。

古有“促织鸣、懒妇惊”之说,“促织”是蟋蟀的古称,又叫“鸣蛩”。“花从月下总吱吱,正是秋声欢唱时”,鸣蛩夜鸣就是入秋的预告:天气渐凉,该准备冬衣过冬。“促织”寿命均在140—150天左右,所以有“百日虫”之称,当秋深冬风劲吹时,它就销声匿迹了,只能等待来年夏天,再次去寻找它的踪迹和优美动听的歌声。秋夜,在近郊的草丛小路散步,再次听到由远至近清脆熟悉的虫鸣,知道这是蟋蟀在唱歌。想起儿时夏秋时节并乘凉,常常能听到蟋蟀的鸣叫。鲁迅先生在《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描述的“油蛉在这里低唱,蟋蟀们在这里弹琴”正是这种清趣。长大后住进高楼,渐渐远离了昆虫们的陪伴。当再次听到鸣叫声,一种久违的确幸感袭上心头,更有幸的是,一只小小的雌性蟋蟀,附在我的左裤角边上,跟我回了家。我小心翼翼将它养在了蟋蟀罐里,放些水养了一晚上,“蟋蟀在堂”。

《诗经·国风·唐风》有吟:“蟋蟀在堂,役车其休。今我不乐,日月其慆。无已大康,职思其忧。好乐无荒,良士休休。”“蟋蟀在堂”,触发了古人在岁暮将至时,对光阴的感悟,表达惜时之情;也在及时行乐和勤于职事两面,主张“好乐无荒”,表现了为官立身行事的态度,内心警惕,时时有所自我告诫。

第二天早晨,去看养了一夜的蟋蟀,它蜷缩在角落,显得孤单。决定把它放生到花园的墙角边,让它可以自由呼吸和行动,和同伴们甜蜜度秋。暂时相别,虫鸣还在秋草间。

可能就坍了。农村申请木料更难:先要到公社,然后再到大队,一级一级申报,而且生产队今年指标已经用完了,要到明年再申请。我父母商量后,虽然为难,但还是答应他了。

周日,农民和家小小孩到我家家来做客,带了一些青菜萝卜,大概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,还沾有泥土。妈妈张罗着接待他们,又塞到我手里两块钱和半斤粮票,叫我到宝丰食品店去买一斤油果子和半斤糖果送给小孩。油果子当时我们过年才有得吃,记得花了八毛八分、半斤粮票,买了一大袋,一路飘香,诱人非常,忍不住想拿到嘴里吃呢!但想起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要贪小便宜,还是缩了手。

钱和木料借给小伙子之后,红烧肉吃不成了,家里的阁楼也搭建不成了,只剩下一根约三米多长的

蟋蟀在堂

汪洁

木料留下来,竖在楼梯墙边上。这根木料是在1986年我家动迁后送人了吗?还是我把它锯开来做书橱了?记不清了。但不管木料命运怎样,妈妈的善良和爱心,永远记在我的心里。那时我们也不宽裕,但她乐善济人。24元,对当时的工薪阶层来讲,不是一笔小钱。我永远记得:妈妈在把2张十元和2张二元的人民币给农民工的一刹那他脸上的神态,好似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!

如今,这里的墙上挂了五六个牌子,中间牌子最醒目,写着:红坊梅泉艺术花园。艺术花园,我默默念道。但在我心中,新华路639号,就是那家木行。看到它,那弹硌路地面上的一堆堆木料就会浮现出来;妈妈那和蔼、坚忍的慈祥面容,以及有关互助金、农民工的那一幕幕,就重新出现在眼前……

笔者于2005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中国玉文化研究专著《古玉新经》,囿于当时的各种因素,总觉得有不少遗憾之处。经历了十多年的积累和准备,《古玉今论——兼良渚玉石文考》终于问世了。书中有很多文章都曾在“夜光杯”上发表过,不少观点纯属个人心得,权当抛砖引玉。其中,良渚“玉石文”的观点,无疑是近些年来自己的最大收

遥谢

徐梦梅

这个观点在国内民间收藏圈里引起了很大反响,尤其是受到上海收藏界朋友的认同和鼓励,有的还把自己收藏的刻有“玉石文”的良渚玉器展示出来,品种之多让人惊叹。要对在探索研究中给予支持帮助过的收藏家、文化学者表示衷心感谢;我们还要跨越时空,拱手遥谢5000年前的良渚先民,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因它而更显精彩。

那天,我在大刘陪伴下,踏湖心岛,登烟雨楼,瞻仰红船……几乎把南湖的美全收进了心底,从心里感激大刘,我抢着买了一大兜南湖菱,大刘摇摇头说:“多了,多了,你明早带

“醉”在嘉兴

吕庆

回家吧。”我不依,把菱全倒在湖畔的石桌上,两人面对而坐,边聊边把一枚枚细腻白嫩的菱肉丢进嘴里,感觉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甜味,真是妙不可言。不知不觉,斜阳与湖水挨在了一起,看着石桌上高高的一堆碎壳,各自摸摸肚子,

像我这样年纪的,恐怕有相当多的朋友都有两个情结:一是翻译片配音的情结,二是俄罗斯情结。那时有两本小说: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和《牛虻》,在年轻学生中,几乎是无人不晓、无人不读,我们所受的一部分教育,应是从这两本书中得来的。《牛虻》本是英国作家的杰作,因为最初的版本是从俄语本翻译成中文的,有些人就会产生一种它是苏联小说的错觉,那么主角当然也就是苏联英雄罗,这倒挺有意思的。

上个月,上译厂忽来电话,邀我在厂里录音棚录制“广播小说”《牛虻》,又说让我配书中主角“亚瑟”。我很开心,当即接受了这个任务。其实,我早在退休前,就有心愿录制《牛虻》,不是一个人又录旁白又录对白,而是做成广播小说的样子。我又一直心仪让孙道临老师来配蒙泰尼里神父一角,总觉得在上海非他莫属。书中有关神父的描述令我印象十分深刻:“蒙泰尼里的声音很低,却圆润、响亮,音调像银子般纯净,因而使他的谈话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。这是一个天生演说家的富于抑扬顿挫的声音。”可惜,当时太晚了。如今真要录《牛虻》了,这样一种角色安排却永远只是一个梦了。

上译厂现在主动策划、组织开辟语言艺术新阵地,录制广播小说样式的外国小说,如《牛虻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基督山恩仇记》(这些小说从前都还配过有关的电影),以此为社会多一点贡献,也积累一些配音的人气,这实在是大好事。这些外国小说,使用的基本上是翻译片厂的演员,毕竟会多一点洋气、贵气,还有自然会流露的必要的腔调,这样一种安排亦是高明的。我知道,上译厂的影迷朋友们,依然在牵挂着上译厂,依然在给予我们温暖的期待,那么对类似以上这样的举措能否也举双手赞成和热切关注呢?

目前,我的所有对白都已录完,将来可在媒体上网上接受大家的评头论足。我自感是应当更好一些的,毕竟现在录东西与十数年前相比是吃力多了。比方嗓子状态,那些语速快、台词量大的段落对付起来也不易;还好,碰到激情戏反倒不那么吃力,只是边上须备上一些纸巾就是了。再说还有许多不习惯。如: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唱“独角戏”,没有现场

演员间的相互交流和刺激;又如:不设导演,无人在边上客观地指点和提醒(而我是喜欢有导演帮着把关的,像从前在棚里配音)。也许碍于种种的原因吧,造成了现在的“新业态”,恐怕今后为了新的合作,亦要有所适应了。

由这回《牛虻》的录制,倒也勾起了我一些思考、一些新的想法。目前都围绕外国小说进行,那么是否亦可开始把眼光也放到中国经典作品上呢?比方:把曹禺先生的经典之作《雷雨》,录成广播剧,在电台和网上与观众见面。我们早就倡议,恢复成立方言话剧团,现在就可以积累一些人才和经验。《雷雨》可用两种版本:普通话版本和上海话版本。我虽已年迈,听起来还马马虎虎,我可报名试一试试《雷雨》中的小少爷一角。尤其是方言版的,我很有创作欲望。让“佐罗”开口说上海话,蛮好玩的。又比方,录制《三国演义》。在上海范围内,通过海选,挑出最合适人选来扮演各个角色。当然,这里的诸葛亮一角恐怕很难寻觅,要慎之又慎,需组织高端学者及有经验的艺人一起来把关审定。

想到最近有一回,我曾询问梁波罗大师兄:依你现在的身体状况,是否有可能安安静静在棚里录制广播小说呢?他回道:这倒是可以的。(哇,我心里内定要推荐他用方言录《雷雨》中大少爷一角呢。)像梁兄这样的年纪都可参与棚里的录音,那么社会上那么多退休的学过表演的朋友,应当更可以“上蹿下跳”了——开个玩笑。确实,继续能从事一份心爱的艺术工作该是多么的幸福。我以此为这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(这里仅指我们话剧、影视领域),如何在身体状况允许、自己又愿意的前提下,尽可能抓住和创造机会发挥这些朋友的潜能呢?这亦是期望上海文化界来真心诚意地作好调查研究的。只要操作得当,亦不必会有影响青年朋友成长的顾虑。

如今,我们上译厂开始开展这方面的活动了,我深感欣慰,又深感,这件事也可以抓紧做,不要像录《牛虻》那样,本或可由孙道临老师来扮演角色,等到这件事落实做了,孙老师却已驾鹤西去。

归根结底,发挥老艺人们的作用,是社会的需要,是人民的需要。

年过八十,千万不要摔跤的忠告,不绝于耳。但防不胜防,在最近的雨天中,间隔不到几天,竟连续发生两次摔跤。

第一次摔跤,发生在女儿家的架空层里。虽为室内,但雨天地转过潮湿光滑,不经意间摔了,除了给女儿送菜的纸袋和我的衣裤沾污水,幸运,无大碍。

第二次,雨中从超市出来,穿过马路,准备乘公交车回家。不料,走在人行道边沿黄黑线油漆上,一滑,又左侧着地。正在候车的一对年轻男女向我走来,想助我站起。我起身虽慢,还是自己站起来。从口袋里掏出纸巾,赶紧擦去裤上的雨水,男青年对我说,你抬头只注意公交车的指示牌,未留意脚下,我连连点头并致谢。痛定思痛,吸取教训,如何防止摔跤?

两次摔倒都发生在雨天,且均在不经意间。雨天地滑,疏于注意,是一大因素,但摔跤的“元凶”,细想之后,竟是它!——每当下雨,因防水性好,也为节约,我总会换上已穿了十几年的旧皮鞋。雨天穿它成了习惯。摔跤后发现,旧皮鞋经长时间步行磨损,胶底的防滑花纹已无,变得十分光滑,遇到湿滑地面,就像在冰面上行走,摔跤的概率就无限大了。

又下雨了,我终于同闯祸的旧皮鞋“拜拜”。穿上防滑的新皮鞋,安全系数大大增加。心想,且不说摔跤骨折的痛苦,单算经济账,买多双骨折的医药费,可买多少双新皮鞋!

如今,在雨中行走,放慢脚步,一心走路,小心翼翼,拿出如履薄冰的架势。“事不过三”,切不可再发生危害极大的摔跤了。我这样提醒自己。



晌午 油画 杨继仁

经不住好友大刘的催促,我快快活活去嘉兴品尝南湖菱了。时下的嘉兴,“绕城菱莲一千顷,三秋菱歌满街头”。南湖菱向来被民间认定为菱中珍品,传说它有“安中补五脏,不饥轻身之功”。吃南湖菱能减肥瘦身,而不用忍受饥饿之苦,多好的“绿色食品”!

五十年前的一个八月底,我第一次到嘉兴用里街上的民丰造纸厂出差。那是个特殊年代,嘉兴全城没有任何市内交通工具,设备处的大刘特地到火车站接我,凭着我捏在手里的一卷油印的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传单接上了头。刚跨上他那辆“老坦克”

的书包架,他就往我怀里塞了一包东西,说:“南湖菱,‘车’上嘴干了,解解渴。”那天,路才过了半程,菱就吃光了,厂子却还没到,倒不是嘴干,是这菱让我“醉”了,几度想再要点,都没好意思向大刘开口。

办完事,已是下午,他推出那辆“永久牌”,用袖管在车座上抹了抹,敲敲书包架:“带你去南湖玩一下。”这正是我心心念念的事,离开上海前,老厂长再三叮嘱我,“别忘了到南湖逛逛”,“一定要尝尝南湖菱”。南湖菱,我早上算“尝”过了,那清冽甘甜的口感回味无穷,我认定,这第一次品尝南湖菱的记忆,伴着大刘憨厚的笑容,永远不会从我心里丢失了。



获。这个观点在国内民间收藏圈里引起了很大反响,尤其是受到上海收藏界朋友的认同和鼓励,有的还把自己收藏的刻有“玉石文”的良渚玉器展示出来,品种之多让人惊叹。要对在探索研究中给予支持帮助过的收藏家、文化学者表示衷心感谢;我们还要跨越时空,拱手遥谢5000年前的良渚先民,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因它而更显精彩。

七夕会

采菱时

间,可又不敢催大刘加速,毕竟,他胡碴子都像菱肉那样白白的啦。

采菱是种菱人家的“瓷器活”,多为女子担当。漾漾湖面上,夕阳西斜,煦风习习,姑娘和少妇们分坐在一个个大澡盆里,用手划水,在歌声中穿梭往来。真是“欲采新菱趁晚风,塘西采遍又塘东”。那湖、那船、那菱、那人,如锦上鸳鸯,玉中翡翠,置身“画”中,焉能不醉?我学着大刘的样,脱掉鞋袜,卷起裤管,踩进湖边浅水,伸手捞了几颗散落的嫩菱,忘了剥壳就贪婪地往嘴里送,在围观者一片哄笑声中,我,又“醉”在了嘉兴……